

如意

刘心武



十月文学丛书

如

意

刘
心
武



北京出版社

十月文学丛书

十月文学丛书

如意

刘心武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57,000字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6,800

书号: 10071·366 定价: 0.62元

目 录

如 意.....	(1)
大眼猫.....	(61)
立体交叉桥.....	(125)
后 记.....	(257)

如意

0

编辑部的工间操时间照例无人作操。有人高声讲着一件什么趣闻，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。偏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在喧嚣中怎么也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。

我朝大伙连嚷带摆手，他们总算减小了笑谈的音量。我才听出来，给我打电话的是老曹——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。自打三年前我调来出版社，我们很少联系，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忙，其实我在学校工作时，和他称得上是难得的相知。

“老曹，什么事啊？”我贴近话筒，大声地问。

他性格不改，无论遇上什么大悲大喜的

事，总能不动声色。我听见他慢悠悠却是单刀直入地说：“学校里的石义海大爷死了。要开追悼会。想来想去，悼词还得请你写。”

我周围的聒噪声仿佛陡然飘向了远处，只觉得自己的心犹如铅砣般往下一坠，我紧紧地捏住话筒，喉咙那儿突突地跳，不由得变了嗓音地问：“哪天死的？”

老曹简捷地报道说：“前天。往医院送的半道上就咽气了，是心肌梗塞。收拾他的遗物，你知道他俭朴了一辈子，哪有什么象样的东西。可是从他那口唯一的木箱里，发现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，包了好几层……”

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里头是什么东西？”

老曹告诉了我。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心里就象有千百个琵琶在“大弦嘈嘈如急雨”，不禁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是这个！原来……”

我的心强烈地抖动着。石大爷的追悼会定于第二天下午开，我答应当晚便写好悼词，第二天请假送到学校去，并出席追悼会。

当晚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忘记了别的一切，只想着石大爷。

秋夜是这般地静谧，静得仿佛能听出远处树叶飘落的声音。我提起笔来，满腔的哀思仿佛都汇涌到了笔尖，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。

石大爷，您如果有灵，您应当驾着清风，趁着静夜，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，让我们象往昔一般促膝而坐，相见

以诚……

石大爷，我想您，您大概也还在惦念着我吧？石大爷啊……

1

我是一九六一年到学校工作的。那时候我们不少青年教师住校，每天清晨，当我们洗漱既毕，或到操场跑圈，或到树下诵读，或赴办公室备课，总会从薄雾或霞光中，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工友，在用大竹扫帚清扫校园。他个子不高，很宽的肩膀，很厚的身板，但却长着一双很明显的罗圈腿；他总是默默无言地低头徐行，一下一下很匀实地扫着。每当看见他，我脑海中就飘过一个淡淡的念头：“啊，石大爷又扫上了……”这念头犹如一根柔弱的游丝，他的身影一从我视网膜中消失，这游丝便也消融在空气之中了。别的住校教师，对他大体上也是这么个态度。

应当为我和同伴们剖白的是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起工友。管传达室的葛大爷比石大爷还老几岁，是个高瘦、嚼腮的老头，据说解放前当过道士，我们就常同他打趣。他知书识字，分发报纸信件汇款单认真负责，还很爱主动同我们谈论时事。石大爷大字不识一个，无法在传达室工作，似乎同我们缺乏一种自然的联系纽带，而他这人又极为沉默寡言，脸上表情很呆板，难怪引不起我们的注意。

直到六二年过“五一”节的时候，我同石大爷才有了一次颇不寻常的个别接触。那天我没去参加晚上的联欢活动，留在学校值班，任务是每一小时沿操场的大墙巡逻一回。石大爷的宿舍是位于操场一角的小平房，因此，不转游时我就呆在他的屋中。

开头，我只是坐在椅子上，管自看自己带去的小说，全然不注意坐在床上捻叶子烟的石大爷是何神态。但是，每当我坐下来看小说，石大爷就默默地往我面前的茶碗里倒茶水，这时，我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于是，当我第三次巡逻回来，便把小说搁到一边，搜索枯肠地同他闲聊起来。

我想到听校长说过，我们这所校址，几十年前是个贝勒府，当年的贝勒府总不会有这么个操场吧，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：“石大爷，当年这操场是贝勒府的什么地方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咋不知道？是花园。”

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《红楼梦》中的某些景致，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后四十回中的“大观园月夜警幽魂”。于是如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，在夜晚，面对着老人，忍不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这花园里闹鬼吗？”

“咋不闹鬼？我就见过。”

石大爷说时，面部表情仍旧十分平板，叭哒叭哒地不紧不慢地吸着他那半尺长的烟袋锅。

“我不信。世界上哪有鬼呢？”

“咋不信？我亲眼见呢。”

“那一定是您看花眼了。鬼是没有的。”

“咋没有呢？我见着了嘛。”

于是象大多数青年人一样，遇到这种口吻，我便又想听又不想听地说：“真的吗？您见着的鬼什么样呢？”

石大爷微微抬起脸，正对着我，他那略呈横圆形的脸上，依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那时候，我才你这么个岁数吧。这贝勒府的一多半，已经归了教会的学校。那时候操场没这么大，东半截是一排排的学生宿舍。学生晚上撒尿撒大木桶里头，木桶就搁在排房的尽头。我是管给学生倒尿桶的，有时候起五更就给倒。有一天，兴许也是今儿这么个气候吧，我起得早点，往排房那儿走。刚走拢，冷不丁见个白影儿一闪。我挺奇怪。那影儿象是个女的，穿着月白衫子，套着黑裙子。你知道咱们学校打那会儿到如今都是男校，只收男生不收女生，深更半夜的，咋会跑出来一个女的呢？”

我要表示不信，又为了壮胆，就胡乱解释说：“个别胆大的女生也是有的，她准是翻墙进来的。”

石大爷的语调依旧平缓迟慢：“不是。我走过去招呼，‘甭藏，你出来吧！’她就从墙角出来了。乌黑的头发，雪白的脸，眼角耷拉着，嘴皮子红得象流着血……”

我插嘴说：“这哪是鬼呀，这活生生是个人嘛。”

石大爷仿佛没听见我的话，愣愣地继续他的讲述：“我跟她脸对脸地站着。我就问她，‘你是人是鬼呀？说！’

她给我鞠了一个躬，哭着说：‘大哥，我是人，我不是鬼呀……’”石大爷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。我的心仿佛在收缩着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他吸了口烟，接下去说：“……我正疑惑呢，只听她又添上一句：‘我的命好苦哇！’说完就转身走了。我看见她光着脚，两脚好象离地一寸多，忽悠悠地，拐过屋角就没影儿了……”

我的头发根根都直竖起来，耳里响着自己放大了的心音，背部忽然有一种空虚和不安全的感觉。想到下一次的出屋巡逻，我忽然胆怯了……

费了好几分钟，我才镇定下来，我想自己是青年团员，应当相信唯物主义，不能中迷信思想的毒素，便正色对石大爷说：“您当时肯定是产生了幻觉。鬼是没有的，没有。”

但是石大爷非常顽固，他表情依旧毫无改变，继续叭哒叭哒地吸着烟，好几分钟以后才分辨说：“我咋会看错呢？后来我想着她可怜，估摸着她准有冤情，就偷偷买了一双袜子，半夜里搁在那天遇上她的地方了。天亮时候我去看，袜子没了。那时辰学生们都没起床哩，不是她收走是谁收走了？打那以后她再没现过形，兴许是报了冤仇了吧。”

这回我连背上的汗毛也竖起来了。一时间说不出辩驳的话来。

“你歇歇吧。我替你转游去。”石大爷站起来，拿起桌上的长筒手电，慢悠悠地走了出去。我把脊背抵住墙壁，

努力克制着心中喷涌的恐怖。我又气恼石大爷的迷信和固执，又感谢他对我的体贴与照顾。

但是这一夜过去以后，当天光大亮时，我对他就只剩下了落后而顽固的坏印象。从此以后，我尽量少同石大爷接触。

2

我同石大爷再次建立关系，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。那时候学校里已经时兴安排听忆苦报告、吃忆苦饭、访贫问苦一类的活动。

有天我找老曹去了。那时候他刚调到学校当党支部副书记不久，已经是现在这副又黑又瘦又出老的模样，其实他当时不过刚满三十八岁。

我见了老曹就诉苦说：“还给学生们的安排什么活动呀？忆苦饭都吃过两回了！……”

老曹沉吟地说：“再安排一次访问活动吧……”

我提高嗓门说：“近处的几个典型都访问过了，往远处跑，停课更得多，还让不让学生学文化呀？”

老曹把头一偏说：“其实咱们学校就有可以访问的对象……”

我急不可耐地问：“谁呀？”当我听到“石大爷”三个字的回答时，简直惊住了：“他？”

老曹点点头说：“我看过他的材料，也到他宿舍跟他

谈过。他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，是个育婴堂里的弃婴，父母想必是当年的城市贫民，养活不起，就把他扔了……他在育婴堂里能活下来，除了罗圈腿，没落下别的残疾，可真是不易呀。他长到十来岁，就被教会学校的神甫要去当了仆人，打小伺候洋鬼子，挨打受骂，干最粗最脏的活……就这么着一直熬到解放。直到五二年这学校被政府接管，外国神甫卷起铺盖滚了蛋，他才算过上了不受剥削、压迫的生活。我看你可以请他给同学们忆忆苦嘛。这样近在眼前的老校工现身说法，也许比外请的人忆苦，对孩子们触动更大。”

我倒不知道石大爷原来有这么典型的血泪史。听了老曹的建议，便去石大爷宿舍找他。进屋时，他正准备下面片儿，要煮片儿汤吃哩。我把来意说了，担心他会拒绝，最后特别强调：“是支部让我来请您的。”

石大爷手里正捏着湿面团，听我说话时忘记了扯面片，任锅里的水沸腾着，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：“行呀，我就讲讲吧。”

他到班里来讲了。一开头，他讲得挺符合要求，虽说表情比较呆滞，语调里的感情还是很诚挚的：“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哪知道当年那洋人欺压咱的苦处……”同学们聚精会神地望着他，倾听着，我十分满意。

但是，讲了十来分钟以后，就听得出来，石大爷对当年教会学校里的两个外国神甫，在评价和感情上都很不一

致：“……如今初三（二）班那教室里，地面不是还有块木头板，上着个锁吗？那木头板底下是个台阶，通到地窖子里头去。那时候洋人可享福了，打那欧罗巴国（他就是这么个说法）运来成箱的啤酒，就趸在那里头。他们想喝酒了，就使唤我下去拿。越是大暑天越想灌啤酒不是？我一天不得下去十来趟才怪呢。那德老爷（他指的是‘德太白’神甫，‘德太白’是这位外国神甫给自己取的汉名），我们下人背地后给他取的外号叫‘面包’，他白得象剥了皮的山药，胖得象个冬瓜。要说懒、剥削人，德老爷跟别的洋人一个德性。可他讲点子仁义，使唤我们的时候，说话透着客气：‘义海呀，劳驾你再给我取瓶啤酒吧。’我给取来送上去了，他还冲我点个头：‘谢谢啦！’遇上他顺心的时候，兴许还剩下小半瓶子啤酒，赏给我喝。那狗娘养的赫老爷（他指的是‘赫爱尔’神甫，‘赫爱尔’也是汉名），可就不是个玩艺儿了，我们下人背地后叫他‘胡萝卜’，他那酒糟鼻子真比胡萝卜还红！‘胡萝卜’使唤人谱儿可大了。一声吆喝：‘给我拿酒去！’咱就得颠颠地赶紧下地窖子。稍微慢点他就兴许扬手打人。有回我从地窖子上来，攥着酒瓶的手直打哆嗦，‘胡萝卜’就跟我吹胡子瞪眼：‘你他妈的怎么回事？抽的哪门子筋？’这小子北京话练得挺油，可不好对付了。我就说：‘这大暑天一身的汗，猛不丁往地窖子里一钻，冷气激得受不住，咋不哆嗦呢。’他嫌我顶撞了他，非罚我到地窖子里蹲一个钟头不成，咱求情也没用，他连推带搯，愣把我推进去，‘咔哒’锁上了木板门。

我就穿着个单褂儿，在地窖子里冻得上牙直跟下牙掐架……多亏了人家‘面包’仗义，不满一个钟头，就把我放出来了。我听见他一个劲地埋怨‘胡萝卜’，说‘胡萝卜’心太狠，不合上帝的旨意；‘胡萝卜’跟他吵，他到了还是护着我……”

想想看，当我听见石大爷说出这么一连串大有问题的话语时，心里该多着急。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地交头接耳。我实在耐不住了，便趁上去给他斟水的机会，似乎是很自然地插进去说：“两个神甫本质一样，‘面包’比‘胡萝卜’更阴险，因为他具有欺骗性……天下乌鸦一般黑嘛！”

唉，胡涂的石大爷啊，他竟偏过头，望着我说：“乌鸦也不尽是黑的，我就在这府后头的花园里，见着过灰胖白肚的山老鹅。”

同学们“轰”地全笑了，我气得脸都白了，往他茶杯里倒的开水溢了一桌。我心里暗暗埋怨老曹，千不该万不该出这样的馊主意，看他给荐了个什么样的报告人，竟然对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这样天经地义的话也提出异议，事后我的“消毒”工作多难做……

我怕他再往下说更“出轨”，便引导地说：“您除了忆自己的苦，也可以把咱们学校原先是贝勒府时候的事儿说说，让我们知道知道府里奴仆受压迫的惨况……”

他嗽嗽嗓子，想了想便说：“贝勒府里缺大德的事多了去！别的甭说，光是到花园子里填井的丫头，我就听说

过一巴掌的数儿。活得好好的干嘛往井里跳哇？还不是让贝勒给糟践了。后来花园子拆了，井也填了，可那冤魂儿还不散，我就见着过……”

我一听不妙，真怕他当着这么多个“祖国的花朵”，讲类似给我讲过的那种鬼故事，便立即打岔说：“石大爷知道的事可真多。其实您不必限于讲贝勒府的事，也可以把咱们这个地区穷人在旧社会的苦诉诉……”

他一口喝下了半杯茶，接过我的话茬说：“人一穷可不就得受欺。咱们这个地方过去受欺侮遭磨难的人可多啦……就好比咱们学校南边，竹叶胡同14号里的金家姐儿们，受的苦大呀。要不是她们姐俩互相照应得好，又赶上这新社会，早不知道撂在哪个旮旯里成了鬼啦……”

又是“鬼”！我看再不截住他，是非出辙不可了，便趁他停顿的当口宣布说：“石大爷年岁大了，最近身体也不大好，今天就暂时讲到这儿吧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感谢石大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！”于是，一阵劈劈啪啪的掌声，便把他欢送走了。

我说“生动的一课”，不过是例行的客套话，可是对于学生们来说，这仿佛的确是生动的一课；一连好多天里，同学们都议论着“面包”和“胡萝卜”，“金家姐儿们”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。一周以后，班委会的小干部们来找我汇报说：“同学们纷纷提出建议，希望把竹叶胡同苦大仇深的金家姐儿俩请来忆苦。”

我正苦于教育活动不易安排，想了想，便同意了。开

好介绍信，我就亲自出马去联系。我想这回得把“底”摸准，倘若这金家姐妹也是石大爷那般混沌，那么她们的家史即便苦得赛过黄连，我也不能请她们来讲。

3

我找到居委会，主任不在，于是便贸然跑到 14 号去了。

14 号是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杂院。六四年那阵，北京的住房问题还没发展到爆炸性程度，自盖小房子的风气尚未蔓延开来，所以这个小杂院倒显得挺豁亮，各处都点缀着一些花儿草儿，房子虽旧，收拾得还比较干净利落。

敢情金家姐俩都是五十来岁的老太太多了。俩人分着过，一家住南屋，一家住北屋，都只有一间房。我先找到南屋，屋里坐着个黄壮的汉子，我认出他是附近煤铺里摇煤球的师傅；同他对了几句话，我意识到他是金家小点的那位妇女的丈夫，他说他“屋里的”在服装厂当熨衣工，现在上班去了。我便提出来要找他爱人的姐姐，他愣了愣，便领我朝北屋最偏东的一间小屋走去，在门口叫了声什么（我没听清），见门开了，指指我说：“找您的。”便离开了。

开门出来的老太太，看着有五十来岁了，瘦弱的身材，长方形的一张小脸，白里透黄的皮肤非但不显得粗糙，反而颇为细腻，但额头、眼角、嘴角都有了极细琐的皱纹。她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结成了一个元宝髻，淡得看不

大出来的两弯眉毛下，一双挺大的眼睛先是惊疑地大睁着，随即又流露出一种饱经沧桑的倦怠神情。把我让进屋去以后，她上下打量着我，懒懒地问：“您是办事处的？”

我告诉她自己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而来。她戒备地望着我，仿佛有点惶惑无措。

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，我尽量先用热情的语调说点闲话：“您爱人上班去啦？”

她眉尖一抖，生硬地说：“他？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”

我这才注意到，这间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，而且比刚才我去过的那间南屋要凌乱得多。样样家具都是些陈旧的劣货——不，只有一样或许是个例外，那是靠在床头的一张紫檀木高脚茶几，这茶几上摆放的两样东西，也比屋中其他任何器物都更干净爽目：一件是一个颇为讲究的打火机，另一件是一只颇为古雅的细磁盖碗。

我又搭讪说：“您妹夫在煤厂工作吧？”

她略微一愣，点点头说：“您是说秋芸她当家的？对。秋芸在服装厂作事。我在家糊纸盒挣点子钱。”说着她指指屋角，我注意到，那里堆着一堆糊好和待糊的纸盒、纸片。

正当我想把话引到忆苦这个正题上去的时候，居委会主任突然找上门来了，说是刚才接到电话，学校打来的，让我马上回去，有急事。我只好告辞，走到胡同里，才知道这是主任大妈用的计。她激动地对我说：“你们找这个人去忆苦可不合适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就是你们校址原